

近代天津的慈善与社会救济

任云兰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总 序

万新平

盛世修史是我国的文化传统。编纂《天津通史》是天津市广大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久已期盼的文化盛事。2004年12月,在纪念天津设卫建城600周年之际,天津市委决定正式启动《天津通史》编纂工作,可以说这是跨入21世纪后天津历史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划时代的文化建设工程。

天津通史作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唯物史观为主导,完整把握天津历史发展的脉络,全面分析天津历史变迁的特征,深入总结天津发展的规律,深刻论述天津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项工程对进一步推进天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进而提高天津城市的文化品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编纂地方通史历来是一个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近年来,地方通史编纂工作方兴未艾,北京、上海、重庆、河北、山东、山西、湖北、贵州等省市都相继编纂出版了大型地方通史。天津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特点。在古代,天津从军事重镇逐步成为畿辅名城,具有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重要典型意义。在近代,天津是近代中国的缩影,“百年中国看天津”,确非虚言。比如,天津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战略要地,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战场,是近代中国政治势力角逐的主要舞台,是近代中国海陆军建设的重要基地,是中国北方城市近代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白区革命斗争的重要中心,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口岸和工商业经济中心。中西社会思潮在

此交汇,新式文化教育由此兴起,一批思想家、教育家和文人巨匠聚集津门,从而形成吸纳百川、包容中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底蕴。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天津克服了国内仅见的艰难曲折,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天津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三五八十”四大奋斗目标和“三步走”战略后,经过全市人民的顽强拼搏和艰苦奋斗,不断取得辉煌的成绩,迎来了天津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滨海新区的发展被正式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不久的将来,一个崭新的天津将引领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并将成为渤海之滨一颗璀璨的明珠而为全球所瞩目。

回顾历史,在中国社会由一个建基于古老农业文明之上的传统社会,逐步向以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天津占有突出的地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拥有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成就与局限、经验与教训、发展与曲折、突破与障碍,都集中反映到天津这一历史文化名城身上,致使天津的演变成为中国城市变迁的重要代表。通过编纂《天津通史》,对天津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可以深入地研究天津、认识天津、展示天津,而且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展示中国。

编纂《天津通史》,是一项汇集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系统工程,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升华和提高,是在新的起点上的开拓和创新。因此,必须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力求在理论构架、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史实资料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必须组织一批素质优良、功力深厚、作风扎实的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因此,从专题研究着手,从基础资料起步,是做好该工程的基本路径。要坚持对天津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把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天津地区变迁的历史全貌,真实地加以展现和记述,深入地总结天津城乡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进程。不仅要研究和叙述天津的规模、形制、建筑和环境,更需要研究和分析其经济特征、文化渊源、社会结构、人口变化、居民素质等发展和演变的内涵;不仅

要注重天津与乡村、市镇乃至环渤海地区、西北、华北的关系和互动,还要关注天津与国内其他区域中心城市,乃至东北亚及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不仅要着重叙述天津本身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演变史实,并从中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还要反映出不同时期天津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要高度重视天津历史资料的搜集和积累。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应该看到,前人已经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天津历史资料,但从编写大型多卷本通史的需要来看,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历代实录、通鉴、类书、文集、方志中有关天津地区的史料,开埠以来各个时期的大量档案文献,特别是散失在国外档案馆和私人收藏的各国租界、领事馆、教会的文件、报告、调查、私人日记等,近现代中外文报刊杂志的记述,以及考古和现存文物资料等等,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征集整理工作,以使《天津通史》编纂工作建立在坚实完备的史料基础之上。

为此,我们根据《天津通史》编纂工作的需要,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天津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汇编为“天津通史专题研究丛书”;将经过专家整理的较为珍贵的中文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选编为“天津通史资料丛书”;将征集到的有重要价值的外文历史档案和书刊资料编译为“天津通史编译丛书”。这三种丛书的编辑出版,不仅有利于提高《天津通史》的研究和编纂水平,同时可以把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及时介绍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对深入地了解天津,认识天津,研究天津,将发挥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总 序

2004年12月,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中华民国史”被确定为首批重点学科给予扶持和资助,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张利民研究员被聘为该学科首席专家。这是天津市委市政府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有力支持和激励,有着重要意义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哲学社会科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地位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新的历史任务,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更加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努力为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在天津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本市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是应当努力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学科建设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中华民国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的学科,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迅速发展,且不断充实、拓展。在一般意义上讲,这一学科属于传统学科,应当按照整体推进、重点突出、点面结合、重点建设的原则,对“中华民国

史”研究学科进行适当调整,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巩固,使之增强活力,适应时代的发展。同时,要重视与其他学科特别是新兴学科的交叉渗透,以增强创新能力。创新是科研的生命,学科创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把握学科建设规律,积极推动学科体系创新、学术观点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

中华民国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具有时间上距离当今时代最近的特点,研究前朝的兴衰会对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有着较为直接的借鉴和参考,同时也需要新的研究思路。由张利民为首席专家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课题组,确定将研究成果汇集为“多视野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说明该课题组具有创新意识,并将这种意识运用到科学研究中。在 21 世纪开展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框架,勾画中华民国发展的总体脉络,评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作用,整理出版档案资料。但仅此还是不够的,对于中华民国史研究应该有新的起点和新的思路。要从 20 世纪后进入全球化的新视角,积极探索中国发展的规律性东西;要重视中国几千年来在思想、制度、伦理、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的浸透和惯性,构筑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框架体系;要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多重需要,从更多领域和视角来研究多层面的发展变化,不放弃从细节与偶然性中探求规律性;要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区域之间的比较、城乡之间的差异,从差异中发现新的问题;要提倡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甚至是自然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介入,进行多向思维与解读;要鼓励新资料的挖掘整理、数据的量化分析,以及用视图传媒、田野考察、口述史等方法获得的鲜活素材,体现历史的丰富性与生动性。总之,要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的职责,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

这套丛书是“中华民国史”研究课题组的部分成果,同时也是一个学术平台,希望研究者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一广阔的空间,锻造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 李锦坤(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6 年 3 月

序 言

“多视野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是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首批项目——“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成果汇集，重点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区域、城市、乡村等多视角论述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变迁。

该丛书所追求的多视野，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中华民国史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顺应当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势，多角度地开拓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新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就制定过中华民国史研究规划，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中华民国史研究迅速兴起，现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无论是系统的通论和专题研究，还是对事件、人物的评介和档案资料的积累，都取得很大的成就，为打开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局面奠定了基础，造就了一批高素质的研究力量，也成为一些科研院所的优长学科。今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一方面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如对于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在外交、经济和稳定社会等方面的作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农村基层社会与经济的演变，城市的管理和社会控制，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的研究，以及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重新评价等。另一方面，还要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层面，如制度创新、机构重组、法制建设、生态环境演变、空间布局态势、城乡社会经济制约、城乡文化生活差异，以及技术改革与社会进步、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控制力与制约因素、时尚与风俗等，从多学科的角度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区域特点与比较研究。通过新领域和新视角的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梳理中华民国发展的总体脉络，总结发展规律和特征，还可以充分论述各个层面的演变，分析历史发展中的细节和偶然因

素,进而更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华民国的兴衰,更生动具体地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轨迹,更客观准确地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

从多领域多角度研究中华民国史是我们的一种尝试。中国自开埠通商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不能仅仅归结为西方入侵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本身长期形成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机制,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价值取向,也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的空间环境、不同领域在发展模式、方法和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和特点。因此,我们将从制度、网络、环境、法律、风尚等领域,论述开埠通商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进入全球化大环境后,中国在城市与乡村、社团与慈善、教育与文化、生活与娱乐等方面的演变;既要有全国的宏观研究,也要有一个区域和城市的微观探索;要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学、法学、地理学、环境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现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并注重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华北区域,其目的是为多角度剖析中国不同领域和侧面的发展历程,探求不同区域发展的特点和范式。

我们相信,多视野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将为民国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和视角,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在华北区域史、城市史、商会与商人、租界与城市社会、义和团与近代社会、民国北京政府与人物等方面的研究有着良好的传统和优势,搜集整理并出版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撰写了相当数量的高质量专著和论文;近代城市史、华北区域史和商会史等方面的研究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赞赏和关注,并连续 17 年编辑出版全国唯一的城市史研究连续出版物——《城市史研究》。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比较完备,有着较为优越的发展潜质。参与中华民国史研究项目的有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研究员,有年富力强的青年科研骨干,博士占半数,是一个稳固的且具有很强凝聚力和相当学术水平的研究集体,在国内外相关的研究领域形成自身的特色和影响。“中华民国史”课题组研究的成果将以“多视野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面世。该丛书按照“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总体规划,对于近代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

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从不同领域和视角开展专题研究,其成果除了课题组内多次讨论审议外,还经过了专家评审,有些成果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的充实和提升,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前瞻性。

当然,作为新的尝试,我们的成果会有诸多不足,我们期望学术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多视野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主编

张利民

2006年2月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其实是云兰的博士毕业论文《近代天津慈善救济事业研究》的修订本。在我国的学位梯阶上，博士是最高的阶级了。我深知一个真正求学、求知、求业的博士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又多么的不易；尽管舆论对于近年来的所谓“博士之滥”贬评如潮，痛恨有加，但我还是对于投身学术的青年才俊报以由衷的赞赏和欣慰。云兰进入南开后，从博士论文选题确定到修订成文经历了整整五年的时间，五年之辛劳和心劳作者颇多感怀，诚不必亦不值为外人道，但作为导师却也深知个中滋味。好在天道酬勤，当博士冠冕有加之时，当博士论文正式付梓之际，所有的付出和牺牲都会释然于成功的笑意之中。读书人其实是最容易满足的。

书稿凝结着作者艰苦的探索和对社会真知的追求。这种对于学术的无怨无悔的追求和执着精神，也催促着我不能不以一吐为快的心情写下这篇序，来表达我对于云兰学术追求的赞赏和对于其学术进步的希望。

这部书稿的选题至少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关于中国慈善救济史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和江南地区，对近代以来华北地区慈善救济的研究较少，对近代天津慈善救济史的研究则更少。二是既往研究多注重于民政史或灾荒史本身，少有从社会史以及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进行探讨者。因此，结合这两个方面的考虑并以此确立研究视角，就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较大的研究和创新空间。近代天津的慈善救济比较发达，尤其是以民间为主的慈善事业成为社会救助领域很重要的一部分，直至今日，天津的慈善救治功能仍引人注目。由于慈善救济事业的地方性

很强,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愈到近代这种地方差异就愈加明显。因此,以天津城市为个案探讨地方特色,不但可以完善慈善救济史领域的研究,而且对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通过这一研究,我们还可以探寻在慈善救济这一公共领域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发生和演变的轨迹与走向。

作者的研究表明,天津由于其特殊的地域和文化特征,形成了具有天津城市特征的慈善救济事业,虽然是官督民办,但民间力量一直在慈善事业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而且慈善救济事业的参与者具有广泛性和多元性。此外,慈善救济的社会功能体现在养育和教化、社会控制、改善民生等方面,而且传统与近代慈善救济的社会功能显有区别:传统时代只注重养育,而近代以后则强调“教养兼施”,慈善救济机构的教化、教育功能得以提升。作者特别提出,在近代慈善救济领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复杂微妙,既有协同合作,也有矛盾冲突。总体来说,在清末和民国初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多时候是良性合作,1928年以后,双方冲突多于合作。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也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有的地方国家力量强一些,社会力量弱一些,双方的合作多于对抗,譬如天津;有的地方国家力量弱一些,而社会力量强一些,双方的抗拒多于合作,如上海。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就是双方在力量的角逐上互相掣肘,最终达到平衡。总体来说,天津在慈善救济领域,官民合作多于对抗,国家与社会双赢,社会和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助于矛盾的化解、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显然,作者在研究中更多地关注着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的价值,尤其对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第三领域”的概念颇多引借。正像作者所言:“‘国家与社会’理论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全新视角,源于此理论的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或第三领域(处于官方和民间的而且官方和民间均参与的领域)的探讨成为近年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慈善救济事业可以说是官方和民间均可参与的公共领域,但怎样以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为视角探讨慈善救济事业是本课题的难点所在,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当然,年鉴学派和新社会史“从下往上看”的研究视角,及其对普通人

和下层社会的关注,事实上也对作者研究工作的展开起着不容低估的影响。努力从现实的“动态中发现和追踪问题,从静态中寻求原因和脉络”,以实现“历史研究本身应具有的功能:温故知新,应答现实和启迪未来”,体现了研究者注重“问题意识”的自觉追求。

以“国家与社会”作为研究的视角,提示着全文的理论意向以此而展开,但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如何将“国家与社会”的实际意义和作用落在实处,而不仅仅是概念化叙述,着实不易,其间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一些理论和概念的运用,或许还可更精审一些。

拉杂写来,也是随感而发。聊以此为序,唯恐既不全面也不得要领,好在读者自可从书中领悟要义,断不至于有偏导之虞。

王先明

2007年5月5日于韩国高丽大学

目 录

导 言	(1)
一、问题的缘起	(1)
二、概念的诠释	(8)
三、研究成果回顾	(9)
四、研究内容的基本结构、创新点及研究的 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14)
第一章 近代慈善救济思想溯源	(18)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传统慈善救济思想的传承	(18)
一、儒家的慈善和社会救济思想	(18)
二、先秦诸子百家的慈善和社会救济思想	(20)
第二节 近代慈善救济思想与实践的传播	(22)
一、西方传教士的慈善实践与救济新理念的萌芽	(22)
二、出洋游历者的鼓吹与思想先驱的倡导	(27)
三、慈善家的实践与近代慈善救济思想的形成	(35)
第三节 近代慈善救济思想的内涵与特征	(37)
一、慈善救济内容的扩大与对象的延伸	(37)
二、从重养轻教到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的变化	(38)
三、赋慈善救济于发展经济中	(39)
四、赈灾中从均平救济到选择性救济的变化	(40)
第二章 天津慈善救济兴起的背景	(42)
第一节 天津的地理位置与华北的天灾人祸	(42)
一、天津的地理位置与气候条件	(42)
二、近代以后华北的自然灾害	(45)

第二节 华北乡村的贫困与农民的生存状况	(49)
一、华北自然灾害后农村经济的凋敝	(49)
二、华北自然灾害后的农民离村	(50)
三、灾害期间及其后的溺婴与人口贩卖	(52)
四、战事与兵灾的影响	(55)
第三节 近代化与天津城市的贫民阶层	(56)
一、近代城市贫民阶层的内涵及其构成	(56)
二、近代城市贫民阶层的生存方式	(58)
第四节 天津经济的发展与商人士绅群体的出现	(61)
一、城市经济的发展	(61)
二、商人和士绅群体的出现	(64)
第三章 灾荒战乱与瘟疫流行期间的慈善救济	(68)
第一节 仓储与粮食市场	(68)
一、前近代的仓储	(68)
二、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粮食流通政策	(69)
三、民国时期天津的粮食市场	(72)
四、灾荒年份天津的粮食价格	(73)
五、灾荒年份天津粮食市场整合	(76)
六、天津粮食市场整合的绩效评析	(78)
第二节 设厂煮粥和散赈	(81)
一、传统时期的粥厂	(82)
二、民国时期的粥厂	(84)
三、粥厂的管理	(88)
四、粥厂的相关设施——暖厂	(90)
第三节 难民的收容与安置	(91)
一、难民的接收与遣返	(92)
二、难民的生活安置	(94)
三、窝铺与临时收容所的管理	(97)
第四节 恢复生产与实现自救	(99)
一、以工代赈	(99)
二、帮助灾民恢复生产	(100)

第五节 难民子女的教养	(102)
一、官方的临时留养	(102)
二、民间的临时留养	(104)
三、对灾民子女的技能培训	(106)
第六节 瘟疫流行与医疗救济	(107)
一、天津历史上的瘟疫	(107)
二、瘟疫流行期间的医疗救济	(109)
第四章 官方的社会救济事业	(112)
第一节 清代后期天津的官办救济机构	(112)
一、养济院、孤贫院与留养局	(112)
二、教养局与游民习艺所	(113)
三、全节堂的设立与育黎堂的发展	(115)
第二节 民国时期天津官办救济机构的演变	(116)
一、民国初年官办救济机构的变革与救济院的成立	(116)
二、救济院的改组	(118)
三、沦陷时期救济院的经营	(124)
四、复员时期奄奄一息的救济院	(128)
第三节 救济机构以外的官办救济事业	(130)
一、举办冬赈	(130)
二、设立贫民工厂	(137)
第五章 天津慈善组织的演变	(140)
第一节 清代后期天津慈善组织的发展	(140)
一、民间社会的发展与慈善组织的多元化趋向	(140)
二、民间慈善事业中三足鼎立局面的初步形成	(145)
三、地方官员在慈善事业中的作用	(151)
第二节 民元前后到 1928 年民间社会的发展 与慈善组织的演化	(154)
一、教养兼施理念的传播与慈善组织的积极救济	(155)
二、红十字会的创设与战场救济理念的传播	(157)
三、贫民半日学社的设立与慈善教育的扩展	(159)

第三节	1928—1936 年国家权力的强化统治	
	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弱化	(161)
一、	从法律上加强对慈善机构的监管	(161)
二、	从组织上加强对慈善机构的监管	(162)
三、	政府接管民间慈善机构——长芦育婴堂	(163)
第四节	沦陷后及复员时期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	(166)
一、	沦陷时期慈善组织的经营	(166)
二、	复员时期慈善组织的命运	(167)
第六章	天津慈善组织的运作	(170)
第一节	慈善组织的空间分布	(170)
一、	慈善组织及其相关设施的选址	(170)
二、	善堂的内部空间构造	(175)
三、	慈善组织及其相关设施的设立与城市的关系	(181)
第二节	慈善组织的运作	(183)
一、	慈善组织的经费来源与经费管理	(183)
二、	慈善组织的人事管理制度	(186)
三、	慈善组织的经营理财	(187)
第三节	慈善组织形成、发达的内在动力及制约要素	(190)
一、	慈善组织形成、发达的内在动力	(191)
二、	制约慈善组织发达的要素	(193)
第四节	地方精英与慈善事业	(195)
一、	地方精英兴办慈善事业的道德和利益诉求	(195)
二、	天津地方精英参与慈善事业的特点	(199)
三、	地方精英参与慈善事业的政治意蕴	(201)
第七章	同乡同业组织的慈善救济	(203)
第一节	会馆与同乡组织的慈善救济	(203)
一、	会馆与同乡组织的设立	(203)
二、	会馆与同乡会的慈善公益举措	(207)
第二节	20 世纪以后商会的慈善救济	(211)
一、	商会与慈善机构人员的互任	(211)
二、	商会的慈善赈济活动及其特点	(212)

第三节 以业缘为纽带的公所与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 …	(219)
一、以业缘为纽带的公所的慈善事业 ……………	(219)
二、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 ……………	(221)
第八章 宗教团体的慈善活动 ……………	(223)
第一节 天津城市宗教的兴盛与影响 ……………	(223)
一、天津城市传统宗教的兴盛 ……………	(223)
二、西方宗教的传入 ……………	(226)
第二节 传统宗教与天津的慈善事业 ……………	(228)
一、佛教居士林的慈善举措 ……………	(228)
二、“卍”字系列宗教团体的慈善活动 ……………	(231)
第三节 西方宗教团体的慈善活动 ……………	(234)
一、西方宗教团体的医疗救济 ……………	(235)
二、西方宗教团体的育婴助老事业 ……………	(238)
第四节 基督教青年会的慈善事业 ……………	(238)
一、常态下以医疗和助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济 ……………	(239)
二、灾荒与战乱期间的赈灾救济 ……………	(242)
三、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社会救济的特点与评价 ……………	(245)
结 语 ……………	(248)
一、天津近代慈善救济的特点 ……………	(248)
二、慈善救济的社会功能 ……………	(252)
三、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255)
四、慈善救济事业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现代启示 ……………	(261)
参考文献 ……………	(282)
后 记 ……………	(301)